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五

中国特色社会学 理论的提升（下卷）

社会运行学派：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

郑杭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五

中国特色社会学 理论的提升（下卷）

社会运行学派：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

郑杭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社会运行学派：前沿
意识与草根精神/郑杭生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5.10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

ISBN 978-7-300-21949-3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6852 号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五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
社会运行学派：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
郑杭生 著
Zhongguo Tese Shehuixue Lilun de Tis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90.25	插页 8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 504 000		定 价	298.00 元 (上下卷)

目 录

三、新型城镇化	(733)
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	
——城乡社会变迁视野下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现实考量	(734)
“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深刻内涵	
——浙江临安“美丽乡村”农村生态建设实践的社会学研究	(765)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社会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致辞	(773)
可行性与可达性：户籍制度改革破题	
“就地上楼”：新型城镇化的社区实现形式	(785)
四、中国经验	(799)
让“包容”牵手“和谐”	
——包容性增长里的中国智慧	(800)
总结南海经验，创建南海模式	
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品牌网群	(804)
——以组织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杭州经验”	(809)
民生为重造福于民的体制创新探索	
——从社会学视角解读“大民政”的本质和重大意义	(821)
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探索的正确路径	
——用更开阔的视野来分析包括“上城模式”的杭州经验	(839)
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的核心	(864)
(875)	

2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中山探索

——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的实践先行者 (878)

社会记忆与乡村的再发现

——华北侯村的调查 (902)

第三部分 重新认识

一、社会学史 (917)

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

——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系 (918)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自序 (931)

当代中国社会学近期的几个热点问题 (949)

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做贡献再认识

——在林耀华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968)

值得庆祝的 30 年，值得纪念的 100 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 30 周年暨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972)

在中国社会学 2010 年哈尔滨学术年会上的致辞 (975)

从科学性和人文性结合的角度来把握韦伯的学术思想 (978)

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 (982)

丰碑 轨迹 时代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重建三十周年暨费孝通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致辞 (988)

“边疆发展中国论坛 2010”第一组“发展理念专题”的

交流发言 (992)

《社会学概论》教材的鲜明特色 (997)

在“2010·中华十大财智人物”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1007)

努力编写面向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学教材 (1008)

2010 年社会学的发展回顾与反思 (1012)

《新世纪中国社会学（2006—2010）——“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瞻望》后记 (1017)

社会学社会工作本科教育要坚持的正确思路

——在 2011 年社会学学科教指委与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上的主题报告 (1019)

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巨大贡献的再认识	(1022)
二、外国理论	(1031)
欧洲福利主义模式可持续性问题的启示	(1032)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	
——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1036)
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	
——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	(1048)
三、国家与社会	(1057)
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	
——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	(1058)
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格局的变化：从“一维模式”向“三维模式”的转型	
——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1068)
社会学领域自由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	(1083)

第四部分 铺路搭桥

一、致辞	(1091)
在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1092)
深刻认识“南海社会管理创新经验”的意义	
——在南海区与华中师大共建社会管理创新博士后研究基地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1094)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与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讲话稿	(1096)
感谢人民大学！感谢社会学界！	
——在“郑杭生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谢辞	(1100)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契机	
——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的开讲仪式上的致辞	(1103)
《感受社会学》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1105)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大人！	(1107)
开创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新局面	(1109)
加强社会企业研究，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在“社会企业与农村扶贫开发”论坛上的致辞	(1111)
方向、品德、学问、健康	

4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

——给全校 2013 级新生的讲话	(1114)
天时地利人和	
——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建系 20 周年建院 5 周年庆祝 大会上的致辞	(1116)
中国社会学关键性的重镇之一	
——祝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 25 周年社会学院建院 5 周年	(1119)
迎接亚洲的时代	
——在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 致辞	(1121)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社会发展”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1128)
世界郑氏宗亲 2013 年荥阳祭祖大典暨河南省郑文化研究院揭牌 仪式上的致辞	(1131)
用中国学术话语阐释小康社会目标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系列丛书” 新书发布会上的 讲话	(1132)
“学术之都”的三个基本维度	(1135)
推动社会学学科的校际合作	
——在 2014 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 闭幕式上的 致辞	(1137)
二、采访	(1141)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 访谈	(1142)
民生为重 百姓至上	
——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	(1151)
郑杭生自述	(1156)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	
——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	(1170)
博士研究生的治学要求及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	(1187)
三、他序	(1193)
《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垕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 序	(1194)

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

——序段华明《城市灾害社会学》 (1199)

对农村艾滋孤儿抚育有创意的探索

——序杨生勇《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支持系统的转型——湖北省J镇农村艾滋孤儿抚育研究》 (1202)

农村社会学的创新性传承

——序钟涨宝主编《农村社会学》 (1204)

大学基金会的系统全面的分析

——序陈秀峰《大学教育基金会研究》 (1207)

开发传统学术资源的新尝试

——序王万俊新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方法解析》 (1211)

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序杨发祥《低生育社会的来临》 (1214)

构建老年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评析张仙桥、李德滨著《中国老年社会学》的学术创新 (1218)

瞬间我们看见了历史

——序谢红莉、瞿佳专著《中国最早的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 (1221)

开发传统、服务现代

——序牛卫国著《留余》 (1224)

进一步推进社会文化的建设

——序张琪《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228)

个体安全的创造性探索

——序杨敏等著《“以人为本”安全观的社会学探索：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232)

流行语时尚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序仓理新主编《流行语与时尚文化》教材 (1236)

序王积超主编的《企业社会学》教材 (1238)

对《后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青年价值观研究》一书简评 (1241)

序张大维《中国共产党的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 (1242)

流行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

——简评“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研究丛书” (1245)

光荣、凝重的历史使命

- 《荥阳郑氏》专刊前言 (1248)
序郑元豹会长主持的《天下郑氏一家亲》 (1250)

一部接“地气”的著作

- 序刘燕舞著《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0—2009）》 (1254)
“读懂中国与世界丛书”序言 (1258)

常向群主编的《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中译版

- 序言 (1260)

一本有新意的著作

- 序张本效的《新型城镇化的社区经验研究》 (1262)
《党的领导与社会建设》序言 (1265)
《转型发展论》序言 (1269)

四、书评 (1273)

一部体现“理论自觉”的宏制巨篇

-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中国民俗史》六卷本 (1274)
从“浙江经验”到“中国经验”：一项社区理论本土化研究

——《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 基于温州杭州湖州的实证分析》一书 (1276)

五、综述 (1281)

中国社会学“十一五”期间研究回顾与“十二五”期间发展

- 瞻望 (1282)

- 2010年北京地区社会学研究综述 (1352)

-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战略 (1372)

发自内心的亲切感

- 我和北京社科联 (1394)

- 充分发挥社科类基金会的引领整合作用 (1396)

- 2013年北京地区社会学研究综述 (1400)

六、悼念 (1415)

悼念文海校长

- 在李文海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1416)

- 悼念挚友陆学艺 (1419)

一个全面“接地气”的社会学家

- 陆学艺逝世一周年的学术追思 (1425)

后记 (1428)

三、新型城镇化

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

——城乡社会变迁视野下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现实考量

从许多方面而言，中国城市化在近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首先，在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多亿人参与、提供了惊人财富的城市化过程，这在现代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次，中国仅仅用数十年时间就取得了欧美国家数百年的发展成果，这种高速率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中国城市化不仅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且也为发达国家主导的生产关系和供需关系的维系和生产—消费体系的运转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城乡社会出现的许多新型社会问题，也是始料不及的。总之，巨大规模民众的参与、巨量财富的聚集、层出不穷的困难和问题，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和所享福祉的提升不同步，社会公平正义滞后，这些现象的反差的确令人关注、引人深思。

一、历史视野下中国城乡社会变迁

以往城市化研究建立了这样一幅图景：城市化是城乡力量彼消此长

* 与杨敏合作。这是郑杭生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3）：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的总论和第一章。该书2013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的部分内容以《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为标题发表在《红旗文稿》，2013（20）。后来全文刊登在《宜春学院学报》，2013（2），文字有所修改，发表时的摘要如下：

从历史视野看，我国传统社会长期因循城乡一体的结构体制。这一体制随着近代西方现代化的深入而瓦解，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化走上了一条“以地为本”的发展道路。“以地为本”的城市化给我国当前社会带来了城镇化率虚高、半城市化、逆城市化等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其实是“土地的城市化”。当今中国城市化发展应该进行由“以地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转变，走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的过程，乡村衰败、城市兴起、城乡对立、城市主导的变迁轨迹贯穿其中；人类生活也相应呈现出三个阶段性进程，即从传统乡村社会时代向城乡二元社会时代转变，再从城乡二元社会时代发展到城市社会时代。事实上，这可以说是城市化研究中的一种较为常见的和固化的解释模式。这一模式勾勒出的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必然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扩张和全盛的过程。不难看出，这一图景与标准的西方现代性理论是高度符合的，以西方城市社会的发展路径作为参照系，引申出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刻画和预期。然而，这幅图景对中国城乡社会的历史解释和现实认识存在着诸多误区和重大缺失，对未来趋向的把握也充满困境。

在当代，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乡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这一令人关切的实际过程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性意义。城市化改变了城市与农村的结构关系，重构了城乡社会的利益格局，重新安排了“身份—权利—待遇”体系。可以看到相互交织的两条宏脉：一条是城乡关系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从最初城乡一体合治到近现代城乡二元分立，再到当代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条是“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演变脉络，展现了从城乡同构体系到城乡差别体系，再到同城差别体系的转变。回溯历史与探察现实，能够把握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变化和纵跃历史的变迁线索。构建包容、公平、共享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过程，将有望绘制中国城市化的一幅全新图景。^①

（一）城乡一体的社会体制

事实上，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不过是现代进程的产物，其历史极为有限。远在这一视野确立之前，中国城乡关系的独有特征早已存在。这是城与乡的社会一体性关系：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亦此亦彼的，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隔离。可以说，乡村与城市始终是中国社会彼此交融的两个侧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农耕生产为基础，浇塑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共同根基，也融筑成了中国历史上城乡一体的社会体制。

第一，传统中国的社会体制是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十分悠久。2008年，陕西省杨官寨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① 参见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载《社会学评论》（创刊号），2013（1）。

杨官寨遗址是约 6 000 年前的巨大史前聚落，现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此外，史前古中原地区先民创造了独特的城市模式——中原城市群。据考，从黄帝时代开始，郑州一带就出现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的城市群，黄帝陪都墟、禹居阳城、夏启迁都、太康建都、商汤建都、商代城市遗址、郑韩故城、阳城遗址等。史前中原城市群也许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项。

中国统一规划的城市体制始于秦。据相关研究，秦统一六国后，普行郡县制，确立了以首都为中心、以郡县城市为网点的大一统的首都郡县制城市体系。城市成为各级政权所在地，城市的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城镇并不是单独的行政单位，城市体制是城乡合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钱穆亦认为，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② 有学者指出：“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欧美学者普遍认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城乡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仅是一个渐进的统一体。”^③ 从研究可见中国城市体制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城乡文化一致性，二是城乡行政一体性。这也赋予了中国城市治理“与欧洲不同”的意义：城市与乡村的位置是平行的，城市在文化上并不比乡村更优越，在行政上也并不比乡村的地位更高。可以说，城乡分野和城乡对立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经由学人的提炼继而形成了一种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

第二，在城乡合治体制的治理框架中，“身份—权利—待遇”体系是城乡同构的。就制度设置的功能而言，无明显差别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意味着城乡人口流动能够保持均衡状态。传统上的中国城市并不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生产与配置中心，不是产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主要基地，城市尚未具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力促使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因而也就无须设置“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体系，从制度规则上对乡村人口流动进行限制。钱穆称“中国向称耕读传家。

^① 参见熊月之：《中国传统城市特质的变易与延续》，载《学术月刊》，2009（2）。

^② 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4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③ 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见《城市史研究》，第21辑，14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①。李泽厚以传神之笔描绘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兼济”与“独善”这两种相互补充的品格^②，更是隐喻了在文化价值和理想诉求方面，乡村具有优于城市的淳远意境。这些都印证了中国传统时代“身份—权利—待遇”城乡同构体系的存在。

传统上中国城乡合治的社会体制表现了城乡自然“一体化”，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西方城市现象显然是很另类的，一些西方学者否认非西方国家前现代时期存在城市文明。其中，韦伯的观点较为极端。在他看来，城市是与乡村分立的另一种共同体，城市也是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独有的现象，西方城市的一些特征（社区、社团、市民等）是东方地区缺乏的。^③ 韦伯对中国城市现象所持的否定态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批评。如熊月之认为，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失败的。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断言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④ 韦伯显然忽视了：在欧洲现代城市形成之前，中国的城市早已存在，这是以欧洲为中心、以现代性为起点的西方城市理论无法覆盖的历史事实。当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现象的解释时，其狭隘眼界必然显露无遗，其研究结论也难免遭到质疑。

（二）走向城乡二元分立的现代中国

欧洲开辟的现代性进入全球扩散的过程，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插入了中西关系的重大历史因素。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很大程度上也受其影响甚至为其左右，近现代意义的中国城市历史由此开始发生。

第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生成如下。从中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多以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作为近现代中国城市的起点。“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的辟设，治外法权的实行，租界的建立，西方的城市规划、司法制度、市政管理、经济管理等制度的引入，中国传统城市演化进程被打断，与西方工业化以后城市相

^①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4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② 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③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5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④ 参见熊月之：《中国传统城市特质的变易与延续》，载《学术月刊》，2009（2）。

似的、与中国传统城市迥异的近代中国城市才开始出现。”^① 此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及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已经形成。中西关系的这种时空方位，不仅标定了近现代中国城市的起点，也标定了中国城市边缘的和依附的地位，既是西方国家的原料、劳动力和初级产品来源地，也是其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无论从外向还是内向的维度上，都可探查到中国城市具有的特殊机制和功能，即生产要素、经济收益和社会财富的输出机制，以及对国际经济体系发挥的支撑功能。

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同步的中国城市相伴而行的一个进程，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严重不均衡性。譬如，城市差距扩大，中东部少数沿海沿江的开埠通商城市发展较快，与内陆城市形成了发展差距；地区差距扩大，东部、中部、西部的不平衡发展格局的持续凸显；城乡差距扩大，随着外国资本输入和本土资本兴起，城市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心，对中国农村的支配和剥夺逐渐导致了农户经济的衰竭。总之，在中国城市步入近现代的进程中，传统上城乡合治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终于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大分流，城乡文化一致性和行政一体性不复存在，开始了所谓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

城乡二元分立过程的种种巨变汇成的大时代背景，绘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底色。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8）等作品，刻画了以村落为单位的乡土社会发生的变化，“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② 费老说的这个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在乡土社会基层上产生的特殊社会，即非乡土性的城市社会。正是在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二元结构的理论前提下，费老建立了一套范式和框架，如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乡下人与城里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等，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化特点及其相互区隔给予了生动的描述与深入的刻画。

第二，“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体系取代了“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同构体系。二元分立的现代城乡关系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城

^① 刘君德、汪宇明：《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革新论》，27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5卷，31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乡平行格局，在行政体制上确立以城市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经济体制上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化体系，城市因而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功能地位——城市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生产与配置的核心基地。处在当今的全球大视野下，国家与市场对于城乡分立发挥的推动力量，其复杂过程仍需进一步的研究。简单地说，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家力量对城乡分治体系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国家主导下，中国城市建立了独特的单位制结构，标志着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市场经济成为了中国城乡社会分离的主要力量。仅从收入分配来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型向市场型的转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历史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目前的30多年间，除了个别年份，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

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二元化过程逐渐催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以往“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同构体系不断消解，“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体系取而代之。当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表现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城乡在户籍制、所有制、职业等区分也划定了城乡居民“身份—权利—待遇”的制度壁垒。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和《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的相关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土地管理法》又延伸出了城乡居民在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上的不同待遇，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分红权、计划生育政策区别以及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政策的城乡差别待遇。总之，中国居民已经分处于“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制度性差别体系之中。

二、以地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中国城市化之惑

在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2%，这一数字在2011年达到了51.27%。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也在迅猛发展，国家实力明显增强，社会财富迅速开发聚积，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从许多方面说，将中国城市化视为本世纪具有全球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并不为过。据说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如此断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

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且也为全球生产关系和供需关系的维系，以及发达国家主导的生产—消费体系的运转做出了贡献。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最新预测，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 左右，未来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 1 300 万～1 600 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 1 000 万～1 300 万。并称，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未来将逐步趋于平稳。^① 每年上千万农村人口移入城市的数字后面，意味着城市化必然面对的各种社会阻力，许多情况下是同时应对来自城乡社会的双重阻力。在未来一段时期里，挤出城市化率泡沫，扭转“半城市化”、“逆城市化”现象等，是实现更加平稳、更加和谐的城市化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时至今日，必须思考的是：“我们的城市化可以为继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还需要回答“我们的城市化何以为继？”这样一个问题。

（一）“土地城市化”的社会代价

当今的中国和世界已经习惯了一个个“中国奇迹”。这些精彩荟萃的奇迹离不开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贡献，其背后更多的是土地与农民、农民与乡土挥别的悲喜记述。这一过程的城市化与土地经济的复杂纠结和连锁效应，不断对中国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投放出深远的影响。

城市化与土地经济复杂纠结的形成及演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制定了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并做了数次修订。特别是 1988 年《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以及同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恢复了土地的商品属性，使得土地融资与信用、土地开发利益返还成为可能，建立了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的土地使用制度。其重要结果之一是城市政府的扩权，譬如征收农村土地的权力，收回城市内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力等。如此，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张成为可能。而且，地方政府以低进高出方式圈售土地，通过土地出让变现可实现财政收入，开发利益还可获得高额回报，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经济与地方利益的链条。同时，以土地批租收益为基础，开辟了一定时期内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来源，地方土地财政机制也由此形成。这个链条的影响辐射到城市化过程：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征地、卖地、融资，再征地、卖地、融资，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

^① 参见《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大可能返乡务农》，中国新闻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8/07/c_123541471.htm。